

防城区党史资料汇编

纪念那良抗日武装起义55周年暨
那良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迁建落成揭幕典礼 专刊

中共防城区委党史办公室编

那良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迁移记

为弘扬爱国革命精神，原中共防城县委、县人民政府早年建于那良中学教学楼前的那良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因学校扩建迁移至此——营盘岭。迁建中增建纪念亭和烈士纪念碑。在十万山区战斗、工作过的老同志慷慨集资，解决迁碑重建费用。迁建工程由中共防城区委党史办和老干局组织实施，防城区建筑设计院设计，防城港市建筑工程总公司施工，于二〇〇〇年七月动工，十月落成。

那良抗日武装起义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不避艰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永启后人。

中共防城港市防城区委员会
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 立

二〇〇〇年十月十八日

防城县那良抗日武装起义

一九四五年端午节，中共防城县党组织领导各族人民，在那良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我县的第一支革命武装——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这支队伍，转战中越边境，抗击日伪军，反对反共顽固派，开拓敌后游击根据地。这是防城县革命历程的重大转折，点燃了武装斗争之火。

中共防城各族自治县委员会
防城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立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那良抗日武装起义英名录

黄木芬	党员	起义部队党代表	参谋长
黄德权		副团长	
项世秀	党员	营教导员	
郑翠兰	党员	政工队副队长	
徐彪		营长	
严端攸	党员	指导员	
黄立洪	党员	中队长	
沈鸿桂		副中队长	
沈耀良	党员	乡长	
沈鸿兰	党员	副连长	
莫培光	党员	副连长	
邓八仔		中队长	
沈季杰		分队长	应为沈季杰
潘崇	党员	司务长	
郑兴强		排长	
黄寿机		排长	
沈鸿欢	党员	外交部司局级干部	
沈奕忠	党员	越南海宁省省委委员	省检察院检察长
余德福	党员	排政治服务员	
严端儒		交通站长	
沈伟		排级干部	
罗木生	战士		
沈鸿善	战士		
沈铭轩	战士		
沈鸿堆	战士		
沈鸿有	战士		
沈明	战士		
严端都	战士		
严端民	战士		
严明章	战士		
黄家升	战士		
赖兰芳	战士		
何宗英		地下交通员	
沈鸿岑	班长		
沈耀游	战士		
黄十八	战士		
沈珍		交通员	
沈火生	战士		
陈凤来	班长		
黄正金	战士		
严端云	战士		
严端柳	战士		
潘华生	战士		
黄正贤	战士		
巫双营	战士		
严南章	战士		
易万枝	战士		
钟三哥	战士		
沈铭才	战士		

目 录

一、纪念专稿

纪念那良抗日武装起义…………… 谢王岗 (1)

深入敌后 英勇抗日…………… 沈鸿周 (6)

从那良起义到新街事变…………… 沈耀勋 (11)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彭 扬 (27)

参加那良抗日武装起义的回忆…………… 陈 生 (37)

那良起义与根据地的建设…………… 严端侨 (43)

组织良中学生参加武装起义…………… 林振辉 (46)

那良抗日武装起义的历史功绩…………… 李禔栋 (49)

试论那良抗日武装起义…………… 宁德棠 郑 云 沈鼎勋 (51)

二、那良起义纪念碑文、迁碑记…………… 中共防城区委
防城区人民政府 (插页)

三、那良起义碑文…………… 中共防城县委
防城县人民政府 (插页)

四、那良抗日武装起义英名录…………… (插页)

纪念防城县那良抗日武装起义

谢王岗

战斗枪声象阵阵春雷，震动着祖国南部边疆。中共防城县党组织在那良领导各族人民，于一九四五年举行了抗日反法西斯的武装起义，至今年已届五十五周年了。

这次起义冲破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统治枷锁，建立起该县第一支奋战在中越边境、抗击日伪、反对反共顽固派的人民武装——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它依靠人民，团结战斗，开拓了敌后游击区和根据地，实现了防城县革命历程的重大转折，写下了斗争史的新篇章。起义点燃了对共产主义希望的明灯，为救国救民作出了贡献，是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的光辉表现。英烈们的革命精神和模范事迹将永垂不朽，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一九四五年，全世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包括我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最后决胜年头。德、意在欧洲战场的败局已定。日寇在亚洲仍作垂死挣扎，从一九四四年夏开始，就发动了打通亚洲大陆交通线的新攻势。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日寇进攻面前，望风披靡，不战而退，丢失了大片国土。粤汉铁路以西、湘桂铁路以南的广大地区。不是处于前线就是沦为敌后，这些地区的共产党人，都在根据党的指示，团结各阶层人民奋起抵抗，力挽狂澜，独立地担负起抗日反法西斯的重任。

这时，防城县的环境相当险恶。日寇从越南不断向我国边疆推进，铁蹄践踏东兴、那良、洞中等边境城镇。沿粤汉、湘桂线及沿海方向进攻的敌人，在占领南宁后，分兵迂回穿插，防城一度沦陷。烽烟四起，战火蔓延。国民党势力中的投降派和顽固派，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放弃抵御而出卖抗战利益，害怕民众起来而藏兵萧墙。国民党政府把正规军全部撤到大后方的同时，拚凑其残留各地的势力，镇压人民的抗战进步活动。广东南路各地，特别是合、灵、钦各地的人民抗日武装起义，都先后受到“围剿”挫折。我国的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诸种矛盾冲突交织、汇合、集中在一起所形成的斗争，是十分尖锐激烈和错综复杂的。

防城共产党和人民的命运，从来没有象一九四五年前后那样，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命运，同各地人民抗日民主斗争的命运，那样紧密联系，息息相关。在这重要时刻，防城的党组织和人民何去何从，作何抉择，面临严峻的考验。由于历史上多方面的原因，当时防城人民的力量还相当弱小，只有几十个共产党员，百十个团结在党周围的进步分子，数百个地下游击小组成员；农村的群众基础比较薄弱，骨干中多数人还缺乏领导战争的经验 and 战斗的锻炼。但是，他们没有被这些来势汹汹的敌人所吓倒，也没有被

种种困难所绊住，毅然决然地选择武装斗争的道路，在那良举行起义，点燃了抗日反法西斯的烽火。

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或事件，那良武装起义的实质，是防城党组织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集中表现，绝不是某些个人的或局部的单纯军事行动。它有完整的准备、发动、挫折、坚持等的发展过程，具有它自己的特点。

一切从实际出发，逐步实现工作重点从城镇到乡村、从秘密到公开、从准备武装斗争到举行武装斗争的重大历史转变，坚决稳妥，不搞片面化和一刀切。从一九四四年下半年，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党组织就有计划地安排部分地下党员和进步骨干分子“上山下乡”，进行抗战动员，发动群众，建立地下游击小组，秘密作“打游击”的准备。一九四五年春，接中共南路特委关于武装起义的通知后，这种动员和准备就急如星火，更加半秘密半公开地放手进行了。这时正值留越法军被日寇包围缴械，部分溃散流窜于中越边境，丢弃大批武器装备，落到各阶层人民手中。我各游击小组，主要是那良地区的游击小组，便紧急行动起来，用收缴、购买、借用等方法，把弄到的武器武装自己，以扩大游击小组和群众基础。这时，分散的小规模的地下武装斗争，实际上已经部分地开始，然后集中力量，组建成骨干队伍，到端午节举行公开的那良起义，已是水到渠成了。起义时，没有把全部力量集中于部队，大部分人员仍分散在全县各地，继续进行其他形式的活动，给起义以支持配合，这就避免了机械执行上级统一规定的所谓“连根拔”的做法。实践的检验证明，这样做的效果比较好。“文革”期间曾有人指责为“不执行”或“不坚决执行命令”，这是不符合理论联系实际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

高举抗日反法西斯旗帜，建立起人民武装斗争的骨干队伍，开展游击战争，开拓中越边游击根据地，是起义的直接行动目标和突出表现。起义部队在中越边境集结编队，宣告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的成立，发布了《抗日宣言》。随即开赴前线和敌后，以塘花山区为根据地，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对日伪军开展作战活动。初战三次，毙俘日伪军小队长以下二十多名，我大队参谋长、党代表陈汉东等同志英勇牺牲。在整顿队伍，总结经验之后，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公开起义时，在我控制的部分农村，保留“合法”形式，建立秘密游击活动区。对国民党地方势力、社会上层、开明人士，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争取同情支持，区别对待的统战政策；对那些动摇观望的国民党基层政权，则暂留原状或争取成为两面政权，以保持某些地区的合法或半合法状态。这样做，有利于更高地举起抗日旗帜，团结更广泛的人民群众，有利于孤立和打击反共顽固派，避免树敌过多，也有利于组建和锻炼队伍，把公开、半公开、半秘密的游击区连成一片，从而扩大了游击根据地。这些，都使起义获得一定的成功。过去有的人因为“没有先集中全力打国民党”，而曾怀疑起义的光辉性质，这是毫无根据的。在民族危机深重、日伪横行面前，在反共顽固派的镇压和威胁面前，我们共产党人揭竿而起，抗

击日、伪军和反抗顽固派的挑衅，为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而战斗。这是具体贯彻执行党的七大路线、方针问题。至于行动部署是否完全得宜，以后在斗争过程中受到某些困难或挫折，例如“新街事件”，那是由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和缺乏斗争经验所造成的，无损于起义的光辉。

采取公开武装斗争为主，多种斗争形式结合，长期打算，相机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斗争方针，避免单纯军事观点和简单化的做法。当时根据对斗争形势和敌友我力量对比分析，估计起义时，难于立即造成割据的局面，同时又考虑到，不起义又会坐失时机，不能迅速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把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因此，在部署起义时，只在工作基础较好的那良区公开发动，动员那良区部分力量及其它地区少数的力量打游击，锻炼成能打仗、能做群众工作、能创造游击区或根据地的骨干队伍，以便逐步建成公开游击战争的中心；其它地区的力量暂时“按兵不动”，着力于支援和配合，加紧扩大宣传发动群众，扩大地下游击小组，开展武工活动，为相机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做好准备。城镇方面仍保留各地原有地下工作阵地，以支持配合起义部队及农村的斗争。这样就避免了过早过大集中使用力量，特别是全部集中到起义部队上来。总之，坚决以公开武装斗争形式为主，又不搞“连根拔”和简单化。这是根据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革命策略的观点和游击战争原则的领会，同时，也初步接受各地起义、特别是紧邻防城县各地起义受挫的经验教训作出的。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比较稳妥，能推动斗争前进；能够使武装力量发展壮大，在各种复杂的急剧变化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有人后来曾因此怀疑说这是“右倾动摇”，“不坚决执行特委起义通知”，这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坚持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是起义的显著本色，也是起义斗争能够发动和坚持的奥秘所在。起义前后，存在一定有利条件，但也有困难和难于逆料的挫折，需要悉心加以排除和克服。开始准备时，因预料不到的情况，曾中断了同上级组织的联系。就只能独立作战，相机行事。开展武装斗争只靠原来的狭小的群众基础不行，就动员大部分党员和进步骨干用各种办法深入山区和港湾，发动群众，创造新的基础。没有钱、没有枪，就先把群众发动组织起来，再想办法解决。钦县小董起义受挫折，有些人员撤到防城县，可是大家没有失败畏缩情绪，团结一起继续干。起义时，组建队伍和行军作战都缺乏实践经验，就决定先投入行动，再不断摸索总结。在塘花遭到日伪军扫荡，陈汉东等同志作战牺牲，但损折同志没有使队伍动摇。总结、接受经验教训之后，继续在中越边境游击区机动回旋，把“游击”坚持了下来。日寇投降后，我队伍在越发动收缴日伪武装，配合“越盟”国际斗争的行动中，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和某些举措失宜，对反共顽固派狡猾的本质认识不足，利用伪越南革命军的关系，以方便一时通行，却遭受到伪越军张午桥部的袭击，以至造成“新街事件”的重大损失和挫折。可是，队伍并没有被吓倒、被消灭，在收容、整顿和接受血的教训之后，又以新的姿态

迎接新的战斗。队伍组建为县人民游击大队，配合“南解”第一团（通称“老一团”）在十万大山胜利地坚持自卫斗争，随后又转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战场上，英勇顽强，前仆后继，一直战斗到最后胜利。那良起义的确涌现出很多英雄人物，坚持发扬了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

有些人由于对上述过程特点的无知或有意抹煞和歪曲，十年动乱中，起义的光辉形象一度受到损害。甚至有人借“新街事件”大做文章。制造冤假错案，散布了大量污蔑不实之词。

这种历史的颠倒，应该彻底颠倒过来，同时，对起义在历史上的意义和作用，也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评价。

众所周知，那良起义是中共防城县党组织领导各族人民公开走上社会政治斗争舞台的标志。共产党是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又一次深刻表明：只有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起义队伍，才实际成为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在民族受欺凌、人民受压迫的危难环境中，只有他们才能挺身而出，肩负起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双重责任，组织和领导各族人民走上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舞台，进行不屈不挠和勇敢机智的战斗。在前线和敌后有条件的地区，举行公开起义，贯彻放手发展和积极斗争方针；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采取隐蔽精干和相机发展的方针；在国民党统治的城镇，继续开展统战工作和坚持地下工作的方针，这样就能全面地发展壮大人民力量，逐步改变斗争形势和敌我的力量对比，更好地为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而斗争。

那良起义还使党组织从狭小的地下状态走向公开领导人民斗争，同广大群众紧密结合的广阔天地，使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经过学习锻炼，党组织学会动员群众，能够领导武装斗争和各种革命形式的斗争，这为以后开拓扩大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也为解放前后各项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防城党组织无愧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组成部分。许多人能够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战士，都同这次公开起义有历史渊源。

防城党组织坚决领导人民，通过那良起义，直接参加了决定人类历史命运的反法西斯战争，把抗日战争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联结在一起。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在一起，给防城增添了值得引为煊赫的历史光辉，以流淌的血汗在祖国边疆上树立起光荣的革命丰碑！从全国的大局看来，那良起义只是一点星火，但从一个局部地区来说，意义却是很大的。因为这次起义，不仅为抗日、保卫祖国而战，而且直接走上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前线。如果说反法西斯战争是惊涛骇浪的战争海洋，那么，那良起义及其斗争，就象是一点崛起的浪花，如果说反法西斯战争象一阵春雷和风雨交加的大合唱，那么，那良起义及其斗争，就象其中合拍的和声。陈汉东等烈士洒在敌后战场上的热血不是白流的，流芳于千秋后世！

事实上，那良起义迈开了防城人民武装斗争最重要的一步，为以后武装斗争的坚持和扩大，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有了开头的一步，才有以后的许多步。大家知道。从起义开始直到迎来全国解放，起义所打下的“基础”，就一直牢固地存在和得到继续扩大，所积累的经验包括血的教训，也长久地发挥了指引和借鉴的作用。这些不仅给以后地方武装配合“老一团”在十万大山胜利坚持自卫斗争以很大的直接帮助，也帮助了主力转移后，小股武装“东山再起”渡过困难，迎来一九四七年三（波）光（坡）企（沙）的武装起义的革命高潮。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光企”的人民武装起义，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那良起义的继续和发展。那良起义以后，对越南以国际主义的互相支援，发动华侨参加抗法战争和回国参加解放战争，有一定的联系和影响；对改变十万大山地区以至粤桂边区的敌我态势和斗争发展进程，也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

那良起义的历史是很可珍贵的。它发生在防城县，奋战在中越边，意义和作用却远远地超出当地的范围；经过四十年的沧桑，随着有关冤假错案的平反，它的光辉业绩一经磨练，便重放光芒，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恢复了本来的面貌。

纪念那良起义五十五周年，我们应该本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宗旨，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学习和借鉴它的历史经验，从中获得启示和教益，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思维，以促进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为此，我们要深入进行理想和纪律的教育。当年那良起义的成功是靠共产主义理想与抗日反法西斯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并用自觉的纪律去保证而取得。今天，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就应该把共产主义理想与搞四化、翻两番，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并用坚强的纪律去保证它的实现。这是共产主义理想在现阶段的具体化，是我国人民当前最基本最重要的实践。我们在理想和纪律的教育中，要发挥共产党人的模范作用和牺牲精神，同人民群众一起去完成伟大的事业。

我们要继续发扬革命传统，加强团结，锐意改革，为振兴防城、改变十万山山区、改变北部湾海区的面貌，作出更大的贡献。战争年代，我们已经作出很大的成绩；建国后，又为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今天搞四个现代化，采取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有可能也应该作出更大的成就，是义不容辞的。

我们一定要端正思想路线，做到实事求是，努力学习，掌握政策，同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深入敌后 英勇抗日

沈鸿周

一九四五年六月，那良抗日武装起义组建起来的钦防华侨抗日游击队，高举抗日旗帜，开赴相邻的越南海宁省，深入敌后，与越南人民并肩战斗，给入侵中越边境的日伪军以有力的打击。在斗争中，不仅锻炼了新生的革命武装队伍，并为我军以后在边境长期开展游击战争打下了群众基础。

一、开辟根据地

一九四五年端午节，由一百五十多人（有六挺轻机，一百多支长短枪）组成的钦防华侨抗日游击队，斗志昂扬地踏上了征途，经过三、四个昼夜的行军，到达了预先选定的根据地越南塘花。

以塘花作为我们的根据地。是因为：一、从群众基础来看，塘花地区有十多个自然村，几千名居民，居民中大部分是华侨和华裔，与我们语言相通，风俗类同，其中为数不少人的祖籍在防城那良，更有同乡之谊，这些群众长期遭受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压迫和土匪的骚扰，现在又面临日寇的入侵，生活十分贫困，对革命的要求十分迫切。二、从地理位置来看塘花南面濒海，北面为一片方圆几十公里的丘陵地带，并与十万山支脉黄摩岭相连，具备广阔的回旋余地。三、从战略观点来看，塘花处在敌据点下居、潭下之间，与日伪军驻地相距三十多华里，连结新街与芒街的四号公路横贯其中，敌人经常四处活动，因此，塘花既是敌人的后方，又是抗日的前线。

我们深知，认真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是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因此，我们把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的工作摆在首要位置。部队在三角灶住下后，便立即组织指战员深入农村工厂，通过访贫问苦、交朋友等形式，宣传我军的抗日主张，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号召各族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时值夏收季节，我们派出大批人员帮助农民抢收抢插，为患病群众送医送药。由于部队关心群众生活、疾苦，深受当地居民的欢迎和爱戴，他们交口称赞：“世世代代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在发动群众中，我们十分重视做好少数民族工作。在黄摩岭里哥瑶寨活动时，我们不但注意针对少数民族的特点做好宣传工作，而且我还与瑶族群众相认“老同”，按照他们的传统习惯，杀鸡歃血，共订抗日誓盟。从而取得了瑶族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在工

作和斗争中给我们多方面的援助。

与此同时，我们对反动分子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为群众申张正义。反动里长黄武生和坏分子何宗勋，长期以来欺压百姓，聚众赌博，强奸妇女，当地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我们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逮捕处决了这两个罪大恶极的家伙后，人心大快，部队威望也得到大大提高，群众更加信赖我们，更积极支持我们。

在提高群众思想觉悟的基础上，我们组织了工会、农会和民兵，当时参加民兵的有工人项世发、郑志农，农民邓七多等人，并发给他们一些枪支弹药，进行自卫。同时还吸收了何宗信、何宗检、何宗枢、黎三伯等加入了我们的抗日队伍。

经过一段时间深入细致的工作，我们与当地人民给下了深厚的情谊，建立了鱼水般的关系，使塘花地区成为我游击队可靠的根据地。民兵们经常主动到公路边巡逻放哨，了解敌情；里哥瑶寨、平河村的群众多次冒险为我们掩护和治疗伤病员；何宗枢的家成了我游击队重要的交通站。在以后的艰苦岁月里，何宗枢一直坚强不屈，积极工作，并为革命贡献了生命。

这次开辟根据地的工作，不仅为抗日活动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解放战争时期的边境斗争奠定了初步的群众基础。

二、打击日伪军

抗日运动的蓬勃发展，使侵略者十分恐慌，不久，敌寇派遣伪军头子何宗月率领伪军三、四十人窜到塘花地区进行破坏活动。他到塘花后，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旗号，用各种卑鄙手段离间当地群众与游击队的关系；搜罗坏人，刺探我军情报，进行反动宣传，说什么“泥蛇成箩不可怕，青竹标一条就不得了。（泥蛇是对我游击队之蔑称，“青竹标”是一种毒蛇，是其自诩之词）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决定消灭这股伪军。

经过侦察，我们摸清了敌人住在位于公路南边的塘屋村，六月下旬的一天清晨，游击队一百多人秘密包围了塘屋村。上午九时左右，战斗打响了，担任主攻的第一中队首先击毙了门前的敌哨兵，十多名伪军闻声冲出，企图抢占山头，我方机枪、枪榴弹、步枪一齐开火，敌人有的当场毙命，有的缴械投降，很快就被消灭了。其余残敌势孤被动，只好龟缩在一间民房顽抗，我集中了几挺机枪和枪榴弹在距房一百多米的地方猛烈射击，为了有效地杀伤敌人，有的同志冒着危险，冲到屋前四、五十米的地方准确投弹，把屋顶炸得瓦片横飞。躲在阁楼的伪军见状不妙，慌忙转到地面，并高叫“投降”，可是等了一会儿仍不见动静，同志们火了，便点燃了旁边的副屋，并通知四周的居民转移出来。只见浓烟翻滚，渐渐威胁到了正屋，有几个怕死的伪军果然爬出来投

降。剩下何宗月及其十来个亲信仍然负隅顽抗，他们在屋内挖墙壁，向我疯狂射击，我分队政治服务员沈季杰同志不幸中弹牺牲，李瑶、郑锡雄两位同志负伤。就在我们调整部署，准备加强火攻和从横门突袭时，山上的哨兵忽报发现大批日军赶来，面对情况的突然变化，加上我方地形不利，为避免损失，我们果断决定撤退。于是留下部分人员掩护，准备阻击，其余部队抬着伤员，押着俘虏迅速撤离了战场。

第二天，惊魂未定的敌人慑于我军的力量，担心再遭歼灭，颓然撤出了该地区。

战斗的当晚，部队移到江尾村，领导人当即开会研究关于处理俘虏、赔偿群众损失和埋葬牺牲同志的工作，并马上派人分头执行。释俘工作十分重要，大队参谋长陈汉东同志亲自负责，他率领九名男女队员，押着十四名被俘伪军回到塘花，连夜召开了群众大会，对俘虏进行教育后，每人发给路费二十元西贡币，当即释放。

由于一些同志想在次日伏击送饷路过那里的日军，当晚他们便在瘦垌村住下了。翌晨，意外遭到了日寇的包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虽经英勇突围，但除沈奕文、郑明、赖贵儒等同志安全脱险外，我们的好战友、抗日游击队的优秀领导人陈汉东同志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郑翠兰、何英、沈淑英三位女同志落入敌手，其余同志隐藏村内，敌人走后才归队。

日寇于进攻塘花的途中，俘虏了我派去与陈汉东同志联系的警卫员沈鸿善同志，并与郑翠兰等一起押往下居关禁讯问。凶恶的敌人当着三位女同志的面，对沈鸿善同志严刑拷打，但沈鸿善同志宁死不屈，最后，被敌人用残酷的手段凌迟杀害。我三位女同志面对敌人的淫威，毫无畏惧，始终同仇敌忾，坚贞守节，直到日寇投降后才得以保释出狱。这些坚强的战士，在侵略者面前表现了大义凛然的气节，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陈汉东同志牺牲后，指战员们十分悲痛。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号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英勇战斗，以实际行动为烈士报仇。

为了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扩大活动地区，更有力地打击日伪军，部队领导同志认真分析了形势，作出新的部署：从原来的两个中队抽调精干人员组成两个挺进队。由严秋和苏勋同志率领，分别推进到下居、潭下一带，监视敌人的行动，伺机出击；剩下的人员组成一支战斗中队，由我和沈耀初、黄奎同志带领，作为机动力量活动于里西的中心地带；政工队仍由巫摩白同志带领，在平河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在大队部撤出三角灶后，我们设置了个“空城计”，留下两个战士在那里日夜烧火以迷惑敌人。

这样，芒街至新街一线已为我游击队控制。敌人到处受到骚扰和威胁。日暮途穷的侵略者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便垂死挣扎，加紧“扫荡”，妄图一举扑灭我抗日烈火。七月下旬，潭下、下居之敌几百人，配备着大炮等精良武器，分兵三路，从冷溪、下塘花、里西向三角灶包抄进攻。我军获悉敌情后，迅速调集兵力，布置两个伏击点，一个

在通往下居的路旁，准备打后撤之敌：一个在里西至三角灶的路旁。

从下居扑来的敌人，看到三角灶“炊烟”袅袅，以为我大部队仍在该处，远远便开炮轰击，几个小时后还不敢靠近，最后方知中计。

由谭下进攻的敌人三、四十名，耀武扬威，列队而来。狂妄自大的敌人做梦也没想到会走进我们的伏击圈，枪声一响，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仓惶之中四散后撤，但接着又遭到我另一伏击区的猛烈打击，溃不成军，只好各顾性命，狼狈逃窜，包袱、鞋帽丢得遍野皆是。我军乘胜追击，把敌人赶出几里路远。该仗毙伤敌人多名。缴获军用品一批。我方只有沈耀良同志一人受到轻伤。

三、艰难的归程

八月下旬，由于形势发生变化，部队决定开回国内活动。为了避免与敌人接触，我们选择了从平河经水挑山、且白、乌山、大细坑至里火这条偏僻的道路。这一带人烟稀少，山径峻险，荆棘丛生，虫豸出没，虽有瑶族同胞盘四哥带路，但在这多雨的季节，山洪爆发，加上经常缺粮缺水，给行军带来巨大的困难，可是同志们不畏艰险，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由于缺医少药，三个伤员伤口恶化，溃烂生蛆，只能由别人抬着走路，每到险要处，严秋、苏勋、沈耀初和何宗检等同志就主动帮助抬担架。面对这同甘共苦，互相帮助的战友情谊，伤员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十几名女同志，手上脚上被蚂蟥咬得鲜血淋漓，她们也不叫一声苦。大队政治部主任巫摩白同志身体弱，当时又发高烧，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行军，是难以忍受的，但他咬紧牙关，拄着拐杖，拖着病弱身躯，一步一个脚印，顽强地跟上队伍。

队伍将要抵达且白时，天色已晚，突然又下起大雨，。雷电轰鸣，山洪奔腾而下，给山沟里行军的队伍增添了更多的困难，一不小心，就可能踏进窟窿，甚至被急流冲走。想点火把照明，担一会儿就给大雨淋灭了。同志们冒着危险。互相鼓励，互相照应，一步一步摸索着前进，好不容易到达且白村，不料当地的瑶族群众因不明真相，惧怕军队，统统走上山躲藏。经历了一天辛劳的同志们又饿又累了，但他们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进群众的空屋，忍着饥饿在屋檐下躲雨休息。经过盘四哥的喊话解释，山上的群众打消疑虑，逐渐回家了，他们一看自己的财产秋毫无犯，又惊又喜，便热情地把我们让到屋里，生火烤衣，做饭烧水，照顾伤员，有的甚至连玉米种也拿出来给我们吃。第二天，还派人帮助抬伤员，一直送出很远。

经过三天两夜的跋山涉水，远征归来的抗日队伍终于到达了我国境内的里火，没有一人掉队。这时，防城地下党负责人谢王岗同志来到部队，召开了里火会议，认真总结了前段斗争的经验，并布置了新的任务。会议决定抽调四、五十个精干人员，继续入越

坚持斗争，其余人员编成几个组，分头到全县各地活动。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防城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热烈欢呼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又在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迎接新的战斗。

从那良起义到“新街事变”

沈耀勋

一、那良起义

我们接受中共防城县地下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家乡发动革命，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沈鸿周同志在大勉，严秋（原名严端侨）同志在那楼，我在修尧村，都组织了秘密的武装小分队，为建立公开的武装队伍准备了条件。1945年4月，日军占领了芒街和东兴，伪军也一度占领了那良，后虽退回越南界内驻守，但我们这一带受到了严重威胁，已经处在抗战的前线，群众抗日保家的情绪高涨。防城地下党根据主客观条件业已成熟，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出师有名。但是武装起义许多问题，如队伍打什么旗号？编制如何定？干部如何配备？起义时间确定在那一天？部队的活动方向等等，都必须深入研究确定。

经过周密的准备，1945年6月12日，是农历五月初三，中共防城县特派员谢王岗同志一身商人打扮，风尘仆仆又来到修尧村，立即召开武装起义的紧急会议，会议在一张小船上召开，船停在修尧村我家门前的北仑河葫芦潭江中心的小石山边，江对岸就是越南的马头山脚，船在江中央抛定，清静安全，可谓万无一失。会议前我早就准备好了开会用的小木船，与会者的饭食，还有警戒放哨，安全保卫工作，都进行了认真的准备。会议在晚上召开，没有灯火，大家坐在小船上只闻其声，不见其面。参加会议的有：谢王岗、陈汉东（周才业）、巫摩白、宋森、沈鸿周、严秋和我共7人。

与会者为远离党中央延安的中越边境上，十万大山的南麓，将出现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心情十分激动。首先要讨论决定的议题是：我们要打击的敌人是谁？团结的对象是谁？要依靠的力量又是谁？

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在欧洲胜利结束，日本败局已定，但它还作垂死挣扎，在太平洋上逐岛固守，在中国战场上发动进攻，在越南陈兵威胁我国边境。因此，我们中越边境处于敌后前线，有必要举行武装起义，最后埋葬日本军国主义，减少战争的痛苦。我们处在抗日战争将要胜利结束，但尚未结束的关键时刻，如何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对付国民党顽固派？是我们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经过大家认真的讨论，一致认为抗日战争将要结束，但尚未结束，我们还是要坚持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和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何况我们还处在日寇占领的敌后前线，更应把打击方向集中打击日伪军，不指向国民党。对待

国民党的地方势力，社会上层人士，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争取同情支持，区别对待的政策，以利于团结抗日。因此，决定起义部队的名称为“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确定部队起义后的活动地区，先挺进到越南境内日寇占领的下居县和潭下县之间的王摩岭塘花村一带农村活动，开展打击日伪军的武装斗争。

会议决定参加起义的人数，以大勉50多人，那楼40多人，修尧40多人，和那良中学一些学生、钦州来的人员，总共约动员150人左右，部队编制定为一个大队，下属两个中队，一个政工队。大勉一部分人员和修尧分队组建为第一中队，大勉部份人员和那楼分队组建为第二中队，女同志和一批老师、学生组成政工队。这样，我们这支队伍，成为工农群众与知识分子相结合的队伍。

关于干部配备，决定大队长为沈鸿周，副大队长沈耀初，党代表兼参谋长陈汉东，政治处主任巫摩白。第一中队长黄德权，政治指导员沈耀勋；第二中队长罗迈，政治指导员严秋；政工队长巫摩白（兼），副队长郑翠兰。沈鸿周同志原是防中学生领袖，在地方上是有威望，有影响的读书人，确定他为大队长，作为公开的领导人最为合适，最具有号召力。干部问题就这样顺利商定，大家都很高兴。

起义时间定为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1945年6月14日）凌晨，即在两天后集结队伍。

会议决定发表《告钦防人民书》，内容主要说明：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是一支打击日伪军的抗日武装，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保护人民利益，军纪严明，秋毫不犯，希望各界帮助和支持我们抗日，保卫家乡。并说明我部将挺进敌后日伪占领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是真枪实刀的抗日。地下党领导人谢王岗，请巫摩白校长执笔起草，这就是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的《抗日宣言》。这个历史性的文献没有保存下来。现在仅能记个内容梗概。

中共防城特派员谢王岗同志还告诉我们，此次动员参加武装起义的，主要是那良地区的大勉、那楼、修尧三地的武装力量，而沿海地区 and 那湾地区以及滩岬地区的党组织和秘密武装仍继续进行地下秘密活动；保存力量，隐蔽发展。这样才能使我们党的工作基础立于不败之地，把公开的武装斗争与地下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但为了培养那湾、海区的武装斗争骨干，准备抽调一批骨干参加我们的队伍，叮嘱我们入越后注意联系。

会议拂晓前结束，大家安全离去。回到各自工作的地区传达布置，经过一天紧张准备，6月13日，起义人员穿上草鞋，扛起武器，背上背包，辞别家人、乡亲，经过一夜行军，1945年6月14日天蒙蒙亮，无数人流汇集到修尧村，小鬼沈奕钜来回摆渡。把部队送过北仑河，在墩吉村集结，中越边境出现了一支高举红旗的人民武装队伍。大家见面，非常高兴，以往处在分散秘密活动状态，互不知道身份，现在得知谁是同志，感到分外亲热。又见我们队伍确是强大，配有轻机6挺，长短枪100多支，其中德制驳壳手枪30多支，子弹、手榴弹充足，武器装备在当时来说是很精良的，人员素质也好，是经过审查